

凭窗读史



三味书屋。

在三味书屋内外

鲁迅与他的塾师寿镜吾父子

最近，鲁迅的塾师寿镜吾之墓在浙江绍兴袁家岭被发现并获得确认的消息，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作为鲁迅少年时期的塾师，寿镜吾曾经作为人物原型，在鲁迅散文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有过传神的描写，并因此广为人知。其实，在散文之外，鲁迅与寿镜吾父子之间还有着长达数十年的友好交往。

“三味书屋”本为“三余书屋”

三味书屋是鲁迅早年求学的私塾名称，在此前后时长达六年。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鲁迅这样描写三味书屋：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扁道：三味书屋；扁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寿镜吾的次子寿洙邻曾在《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一文中也详细回忆了三味书屋的若干细节：三味书屋是寿家先人书斋的名称，坐东朝西。清嘉庆年间，寿洙邻的曾祖父寿峰岚购置此房，坐落地点在绍兴城东门内覆盆桥西，占地六亩有余，前临小河，架石桥以渡，后有竹园，修竹千竿。到1956年寿洙邻写这篇回忆文章的时候，覆盆桥街道的名称已改为鲁迅路，三味书屋也改为鲁迅纪念馆的一部分了。

据寿洙邻介绍，“三味书屋”四个字的匾额，是清代书法家梁同书所写的，但梁氏原本写的是“三余书屋”，寿洙邻的曾祖父寿峰岚将“余”字改为“味”字，“味”字系寿峰岚补写，细看笔迹，与梁同书“三余”原意出自《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董遇言：“为学当以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而“三味”的出处，据寿洙邻幼时听父兄传言，是“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饌，诸子百家，味如醢醢”。但已忘其出于何书，至今查不着了。

2005年版《鲁迅全集》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注释，首先引了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百草园和三味书屋》里的一段话：“关于三味书屋名称的意义，曾经请教过寿洙邻先生，据说古人有言，‘书有三味’，经如米饭，史如肴饌，子如调味之料，他只记得大意如此，原名以及人物已忘记了。”该注释随后引宋末代学者李淑《〈鄙事目〉序》：“诗书，味之太羹，史为折俎，子为醢醢(xīhǐ)，是为三味。”

其实，早在唐朝段成式《酉阳杂俎》序文中，就已有“三味”的说法。段成式在序文中写道：“无若诗书之味大(同‘太’)字，史为折俎，子为醢醢也。”

关于“三味书屋”之“三味”，寿洙邻之侄(其兄寿洙邻之子)寿宇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解释，也可备一说：寿峰岚授意儿子把匾上的“余”字改为“味”字时就阐明了此“三味”之义：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他将这三句话作为私塾的教学方针，并要以此作为世代相传的祖训家规。要甘当老百姓，凭自己劳动做人，要甘于过清苦的生活。

寿镜吾对鲁迅的影响

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用寥寥几笔勾勒出一个“老先生”的形象：“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

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了解鲁迅生平的人都知道，这个“老先生”就是鲁迅早年的塾师寿镜吾。

寿镜吾(1849—1930年)，名怀鉴，字镜吾，浙江绍兴人。他曾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考取会稽县的秀才，后因不满列强侵略与清廷腐败而厌恶功名，遂不再去参加乡试，而在绍兴都昌坊的家中设馆授徒。据鲁迅三弟周建人回忆，寿镜吾老先生教学很严谨，只收8个学生，认为收多了教不过来，而且只收平民百姓家的孩子和书香子弟。

寿镜吾对学生要求严格，但从从不体罚学生。对于鲁迅，更是每每称其聪颖过人，品格高贵，自是读书世家弟子。据寿洙邻回忆，“镜吾公不喜八股文，喜抄写诵读汉魏六朝古典文学，积数十本，往往吟咏不已，鲁迅耳有所闻，即心领神会。”鲁迅完成老师规定的作业后，“往往不理正课，杂取古典文学及小说诸书，置抽斗中暗阅。”

寿镜吾富有正义感，有一年，他联络乡民状告当地恶霸金四一拆毁他人路道为自己建新寓，后遭流氓恶棍殴打，但他毫不畏惧，带伤一人再次状告并要求官府严办。他自甘清贫却乐于助人，周建人回忆：“有一次坐船下乡，遇到大风，把船篷吹走了一块。船主要去捞，寿先生赶忙拦住，说太危险了。船主说，一个篷要两元钱呢！寿先生说，我陪你。回来后，果然赔了两元钱给船主，船主很感激。”

寿镜吾认为，在昏君、贪官、佞臣当道的乱世，正直、有骨气的读书人不应该去做官，去为腐朽的统治阶级效力。鲁迅摒弃读书应试的“正路”，去南京水师学堂“学洋务”，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寿镜吾的影响。在小说《孔乙己》《白光》中，鲁迅通过刻画旧知识分子的可悲形象，深刻揭示了科举制度的毒害。

1898年至1901年，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每年放假回绍兴，必定去看望先生。二人时常也有书信往来。据寿洙邻长子寿积明回忆：“鲁迅先生每次来时，祖父总是在三味书屋接待他……祖父和鲁迅先生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一谈就是半天。”据寿镜吾之孙寿宇回忆：“每年春节，鲁迅总是用‘大红八角笺’给我祖父写‘拜年信’，以‘镜吾夫子大人函丈，敬禀者’开头，以‘敬请福安’结尾，下具‘受业周豫才顿首百拜’之类的。”

《鲁迅日记》50多次提到寿洙邻

寿镜吾之子寿洙邻(1873—1961年)名鹏飞，字洙邻。寿洙邻中秀才的时候，寿镜吾开设的私塾三味书屋正在鼎盛时期。寿洙邻想到三味书屋书房的南还有耳房一间，上有匾额，书“谈余小憩”四字，为康熙年间绍兴著名书家雪岩山人金炳所书，环境清雅，便决定在此另辟一室，由寿洙邻在这里开设一班，学生四五人。

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就是在寿洙邻随父教书的时候，到三味书屋来读书的。有



寿镜吾。

时寿镜吾因事外出，两个书房就统归寿洙邻管理。寿洙邻回忆：“大约在光绪辛卯年(1891年)正月，鲁迅十二岁，来我家从镜吾公读书。”“鲁迅先来，师事镜吾公，称我为四哥。知堂次年来，师事于我，称我先生。”在这里，寿洙邻对于自己与鲁迅及周作人的关系有非常明确的界定。

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寿洙邻与他父亲之间产生了尖锐矛盾——他对科举之路情有独钟，并走上仕途。1912年初，鲁迅应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离开绍兴到教育部任部员，同年五月初又随教育部到北京。这时寿洙邻正担任平政院首席书记官，鲁迅与寿洙邻再次见面，两人之间交往密切，从1912年9月至1929年3月，《鲁迅日记》中提到寿洙邻的地方，就有52处之多。

1920年，鲁迅开始在北京大学兼课，讲授中国小说史。不久小说史讲义正式出版，名为《中国小说史略》。寿洙邻见书后，帮助鲁迅纠正了一处地名上的错误。寿洙邻说：“鲁迅博览中外书籍，仍极虚心，他所作《中国小说史略》内，误以溧阳为今河北省滦县地。我曾游溧阳，知为今热河承德县地，其西为滦平县，在滦河上游，纪晓岚《滦阳消夏录》，即扈跸在热河避暑山庄所作，非今滦县。因以钝拙的隐名，作书告之。鲁迅即行更正，并致谢于书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再版附识》中写道：“此书印行之后，屡承相知发其谬误，俾得改定；而钝拙及谭正壁两先生未尝一面，亦皆贻书匡正，高情雅意，尤感于心。”寿洙邻终其一生都没有将“钝拙”就是自己这个真相告诉鲁迅。

1926年，鲁迅因为支持女师大进步学生运动，被免去了教育部金事职务，鲁迅向平政院提出控告的时候，寿洙邻正在那里当首席书记官。平政院公正地判决了恢复鲁迅的金事职务。鲁迅离开北京后，寿洙邻及其夫人曾玉棠常去宫门口鲁迅家里，拜访鲁迅母亲鲁瑞和鲁迅夫人朱安，以使鲁迅可以安心在外地工作。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故，寿洙邻参与发起善后委员会，并以悲痛的心情为他写下挽联：“桃李满门墙，雪中独欲梅花瘦；文章在天壤，意外时闻木樨香。”

张德斌



姚茫父作《陈师曾小传》并题于王梦白所写《师曾遗像》。(朽者不朽：中国画走向现代的先行者——陈师曾诞辰140周年特展，2016年12月8日摄于中国美术馆展厅。

文人画的守望者

纪念陈师曾、姚茫父、陈半丁诞辰150周年

十年前的深秋，中国美术馆同时举办了两个特展：纪念陈师曾诞辰140周年的“朽者不朽”，纪念陈半丁诞辰140周年的“此中有真趣”。两展时间交叠，展厅相望，仿佛是一场老友的老友相聚。然而，有心人或许会在心底生出一丝怅然——那个与陈师曾并称“姚陈”、与陈半丁交游至深的姚茫父，缺席了。

今年是这三位同龄人的150周年诞辰。他们以“同庚”的缘分相遇，以“同道”的志趣相守，共同见证了文人画从旧时代的余晖，走向新的蜕变。十年前展览上之“缺”，或许正是历史留给后人的一处留白；等着我们循着墨迹与诗痕，寻访这三位守望者的身影；用追怀、用纪念，为他们补上一次同庚之聚。

壹

历史总是饶有趣味。当日月轮转、时空交织，奇妙的因缘便在不经意间悄然发生。

光绪二年(1876年)，岁在丙子，生肖属鼠。那一年，三位后来同辉于北京画坛的文人先后降生于世——

3月12日(农历二月十七)，陈师曾出生在湖南凤凰县；两个多月后的5月14日(农历四月廿一)，陈半丁出生于浙江山阴县(今绍兴)；五天后5月19日(农历四月廿六)，姚茫父出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

陈师曾出身于近代中国最负盛名的书香门第——祖父陈宝箴官至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同光体”诗派领袖，弟陈寅恪日后更成一代国学大师。这样的家世，注定了他从小浸染于诗文书画之中。1902年，27岁的陈师曾东渡日本留学，攻读博物学。1913年，应教育部之邀赴京任编辑，先后兼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教授。他很快成为民初北京画坛的实际精神领袖，时人称之为“画坛盟主”。

姚茫父生于贵州大山，四代清贫，却笃志于学——20岁童子试中秀才，29岁中进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旋公派日本攻读法政。1907年底结束留日回到京城，入邮传部任职；辛亥革命后，他辞政从学，先后执教于清华学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等校，并执掌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与私立京华美专专科学校。茫父博学通邃，于诗词、曲赋、金石、音韵无所不精，与陈师曾并称“姚陈”，被公认为民国初年北京画坛的“京派领袖”。

与前两位相比，陈半丁的身世最为坎坷——幼年父母双亡，家境贫寒，15岁在钱庄做学徒时开始接触笔墨，“嗜书画入骨，饥俄犹不顾也”。19岁随叔父吴德来到上海，有幸成为吴昌硕入室弟子，并得任伯年、蒲华等海派前辈指授。1906年，他受金城之邀北上京城，开启了“南风北渐”的历程，将海派画风带入北方画坛，与陈师曾并称“二陈”。

他们家境各异，背景悬殊，彼时相隔千里。然而四十年后，三人却因共同的兴趣、爱好与志向，不约而同走进民国初年京城的最光景。

贰

民国初年，北京画坛“艺术之盛超过前代”的一段时光，是“陈画姚题”“姚陈辉映”的年代。他们对人生、世事、艺术的态度高度契合，与陈半丁亦因作为吴昌硕弟子、艺术志趣相投而一拍即合。

在西方写实主义冲击、传统文人画备受质疑的时代背景下，他们重新发掘和阐释文人画的精神价值，既回应了“美术革命”的挑战，也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不同于写实主义的另一条路径——即坚守文人画“人品、学问、才情、思想”的内核，以此为基础吸收外来营养，“舍我之短，乘人之长”。陈半丁不仅是这一理念的认同者，更是这个文人画核心圈的重要成员，足称他的同画“古奇能香艳，世间脂粉轻”。陈半丁的篆刻、书法与绘画，正是“以书法入画”“以金石滋养笔墨”理念的生动实践，与陈师曾、姚茫父共同构成民初北京画坛传统派的中坚力量。

三个同龄人同唱和共雅集有过多次生动的场面，他们“或十日一会，或月一寻盟”，诗酒唱和，书画遣兴，文艺品鉴……令人悠然遐想，有出尘之志。1922年，姚茫父曾邀同生于丙子年的陈师曾、陈半丁、陈翼年、林长民诸好友作图赋诗，驰骋在古今、天地、人我之间。

这一年，苏东坡诞辰885周年，罗园雅集的寿苏活动达到了高潮。罗园主人罗雁峰邀请京城画家雅集，是日，与友人合作多幅，其中包括与齐白石、陈师曾、凌文渊、陈半丁、金拱北合作的《花卉卷》。还有王梦白画猪，陈师曾以竹补之，寓东坡“宁可食无肉”轶事；萧萧中、周肇祥、姚茫父合作《前赤壁图》等等。至晚，月明星稀，笛声如怨如慕，取东坡赤壁泛舟之意——那一夜的笛声，仿佛是为这群文人画的守望者吹奏的千古绝唱。然而，三个丙子年生人，却有着全然不同的归宿。

陈师曾走得最早。1923年，他得知继母病逝于南京散原别墅，又冒着酷暑前往哀痛奔丧，因劳累过度突发痢疾，竟于南京病逝，年仅48岁。

陈师曾生前庭院有一棵槐树，故号“槐堂”。陈半丁于大病初起之际，仍坚持为好友创作了一件《槐堂思亲图》，以记其“思亲”之痛，足见二人情谊之深。

《槐堂思亲图》绘的是身着长袍的陈师曾枯坐于山

石上，脸庞瘦削，面容憔悴，若有所思，一棵古松矗立于前，古韵中显见生机。陈半丁并不以人物画见长，但这幅图中他所绘的陈师曾形象，可谓神形兼备，得其哀痛悱恻之思。此画与王梦白所写的《师曾遗像》以及姚茫父所作的《陈师曾小传》构成了北京画坛的一个时代终结。

叁

一日，陈师曾问王梦白、金城，画可比喻什么？王梦白风趣地说：金城(拱北)画画像“裁缝”，规矩矩矩；自己画画像“铁匠”，可随意回炉重来。陈师曾听后评价：“拿梦白的天才，拱北的学力，把他们两方面的长处，融合在一起，彼此的成就更有可观了。”大家相视开怀一笑。等到画家们再聚时，姚茫父及陈师曾不在了，“凄凉犹忆人惊座，回首隔年泪暗倾”。

陈师曾去世后，姚茫父与陈半丁、齐白石、王梦白、凌文渊等画界同人一起在北京樱桃街贵州会馆组织了第三次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1924年)，他俩继续留在中国画学研究会，融入对自然的观察和个性的抒发，去藩篱，写胸臆，仍然是彼时“京派”绘画的中流砥柱。

姚茫父51岁时猝患脑溢血，从此左臂瘫痪，忍痛继续创作，1930年病逝于北京莲花寺，享年55岁。

多年后，齐白石回忆陈师曾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师曾提携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记不了他的。”他在怀念陈师曾时仍然记得当年的“陈画姚题”，“安阳石室人何在？题句姚华去不还。”(安阳石室是陈师曾的斋名)。1944年凌文渊去世，齐白石作《哭凌直之》，同样并提“姚陈”，“倘若姚陈知识在，相逢应续旧风流”。

生前与白石老人并称、身后却相对落寞的“半丁老人”，后半生经历了命运的坎坷起伏，亦是时代的缩影，直至1970年以94岁高龄谢世。他一生作画不辍，将海派与京派熔于一炉，成为连接两个时代、两种画风的活化石。

如今，陈师曾的《北京风俗图》依然生动，姚茫父的题词依然奇崛，陈半丁的花卉依然苍润。宣纸上的墨迹，是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光。而他们三人之间的情谊——陈师曾与姚茫父的“姚陈”辉映，姚茫父晚年与陈半丁的相伴——则如一部可临可慕的碑帖，供后人一读再读，一摹再摹，在那笔墨与情义的深处，寻见中国人最恒久的守望。

称他们为“文人画的守望者”——不是因为他们在时代的洪流前固步自封，而是因为他们在以开阔的胸襟拥抱新知，却始终守护着中国画最核心的那一缕文脉。15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凝视这三位同龄人，或许也是在凝视：何为守望，何以守望。

王碧蓉



陈半丁槐堂思亲图。